

论弗罗姆心理学说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郭永玉

华中师大

弗罗姆(Erich Fromm, 1900—1980)是本世纪的同龄人,他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八十年。这个不平静的时代造成了他的不平静的内心世界。他总是热切地关注着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处境、命运和心灵,不知疲倦地向人们表述着他对世界、对人生的观察和思考。因而不考察弗罗姆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氛围,我们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

美国科学哲学家科恩(Robert S. Cohen)曾经概略地描述过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的时代标志是:伟大的革命,巨大的战争,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人类的生活与文化的机械化的执著的趋向。”^①其中,战争和生活方式的机械化趋势对人的影响,是包括弗罗姆在内的许多西方思想家所特别关注并引起了广泛讨论的。

本世纪最强烈而深远地影响人们内心的事件无疑是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留下的创伤和对新的战争的恐惧给人们的生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整个世界备受战争蹂躏,人们感到即使在自己家里也是不安全的。战争和新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的威胁)导致了人们对人生和道德进步的怀疑和对人类可能自我毁灭的担忧。传统的价值系统毁灭了,新和信念还没建立。人们生活在莫名的愤怒和不安之中。

弗罗姆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思考与战争有

关的心理学问题,他在著作中经常讨论法西斯主义,谴责军备竞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少年弗罗姆就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萌生了许多疑问,这些疑问促使他走上了探索人性与社会生活的规律的道路。^②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更深刻地影响了弗罗姆,他被迫流亡美国,并在1941年出版了主要研究纳粹主义的心理学问题的《逃避自由》一书,这本书使他一举成名。

战后的西方经济逐步恢复过来,进入了一个持续的繁荣时期,物质财富空前富裕,科学技术空前发达,人的许多需要都可以只按一下开关或拧一下旋钮就很快得到满足。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所以一方面它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是对自然的贪婪的索取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并使人感到失去了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再就是社会生活的机械化倾向。人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被机器所控制,而且在生活中被庞大的官僚机器、被形形色色的传播媒介背后的“匿名权威”所操纵,人的一切活动都似乎是预先规定好的,被某种程序控制着。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变成了工具。人失去了个性,失去了人作为人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无孔不入的商品经济也危害着人的精神

健康。生活的目的似乎就是金钱,就是尽可能地生产和尽可能地消费,似乎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包括买到幸福。这样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只关心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只关心利润而无视人的存在。

其它如由性与爱的纠葛引起的困惑、社会公正(贫穷和种族歧视)问题、教育问题等等,都是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严重问题。

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弗罗姆并进入他的研究视野。作为一个长期开业的医生,他研究了许许多多的由这些问题引起的不幸的现代人,创建了一整套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

要更深入地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症结、弗罗姆的理论本身以及他为什么受到广泛欢迎,我们必须提及六十年代末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激烈的学潮和工潮,特别是作为这一系列造反事件的典型的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尽管弗罗姆与这些造反事件没有直接联系,但显然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因为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的思想武器。他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一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孜孜不倦的批评者。而在反抗运动失败后,青年一代又把弗罗姆看成发泄不满的喉舌。^④

现时代的社会现实是思想家创造的源泉,但这种创造离不开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研究思想家对文化遗产的选择性继承是研究他的思想创造所必须的。

正如弗罗姆自己和其它许多研究者所提出的,对弗罗姆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他力图将这两位思想家结合起来,当然这不是他的目的,他是要创立一种新的理论来表达他对世界的理解。

据弗罗姆自己说,他之所以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兴

趣,与他的一些个人经历有关。他是一个独生子,父亲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母亲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在这个家庭中他感到孤独,并对奇特神秘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发生了兴趣。他很喜欢的一位富于魅力的年轻女画家,一直不结婚,总是陪伴着她那位在弗罗姆看来索然寡味,其貌不扬的丧偶的父亲,她父亲一去逝她就自杀了,并留下遗嘱说要同父亲合葬。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十二岁的弗罗姆,他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直到十年后他才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找到了答案,并被这种学说吸引住了。

真正决定他成长道路的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对战争的疑问越来越多,他希望理解那些在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的大众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探索支配个人生活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当时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在国会投票反对战争预算,批评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这一切促使他接近马克思主义并感到可以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找到他所思考的问题的答案。^⑤

弗罗姆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共同基础概括为三句格言:怀疑一切。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二者都是用动力学和辩证的方法来研究现实的。这是弗罗姆作的理论概括,但我们更关心弗罗姆在创立他自己的理论过程中,事实上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里吸收了哪些共同的东西,这二者是紧密联系的,但不是一回事。正是后者构成了弗罗姆全部学说的灵魂。弗罗姆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共同点并加以继承和发展的。

理性主义。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相信真理的解放力量(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马克思坚信真理是变革社会的有力武器,他一生主要是在从事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科学研究,并以此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基础。弗洛伊德则坚信真理是变革个人的有力武器,精神分析的实质和目的就是帮助病人理性地认识

自己,认识被各种幻想掩盖着的非理性的现实。“弗洛伊德身上最显著的,也许是最强烈的情感力量就是热望真理、坚信理论”。^⑤弗罗姆继承了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人和社会,并把理性作为健康人的基本能力和标志,作为未来社会运行机制的原则。

人本主义。人本主义^⑥的基本含义是人具有共同的本性(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因而人生来是平等的,应当相互尊重。理想的社会应把人本身作为目的,把人性的健康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目的。弗罗姆认为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都一直以人本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之一,并以人本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人本主义”^⑦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真正的自由王国是将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⑨,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⑩弗洛伊德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现在他的“无意识”概念中,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无意识的冲动,所以一旦揭开了无意识这个隐蔽的世界,人们就会相互理解。^⑪弗洛伊德还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性道德的虚伪性,论证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合理性。弗罗姆始终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来继承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遗产并对法西斯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

批判精神。在马克思的个性和思想中都体现着一种不屈不挠、锋芒逼人的批判精神,即“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不仅要有“批判的武器”,而且要有“武器的批判”。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揭示也体现了一种彻底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发现人的大部分思想是与现实不相符的,而大部分实际存在的现实又没有被意识到。弗洛伊德把怀疑的目光投

向了那些人们感到理所当然并深信不疑的领域。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都是批判的理论。弗罗姆对精神分析在后来失去了它最初的激进的批判的特性而感到痛心疾首,并力求恢复和发扬这种精神。

救世主义。批判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摧毁,而是改造,是建立新的世界。破是为了立。马克思虽然不相信也不愿做救世主,但在他身上体现着一种改造旧世界把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从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强烈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这同他反复强调的工人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并不矛盾。弗罗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一再论述了马克思的救世主义精神。^⑫弗罗姆在分析弗洛伊德的人格时着重指出,弗洛伊德一直怀着一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的志向”,他“深切关心的不是医学,而是哲学、政治和伦理”,他是“披着治疗学家和科学家外衣的一个伟大的世界改革家。”^⑬精神分析最终要达到变革社会 and 文化的目的。弗罗姆也一直对政治和宗教有极大的热情。他说他从十一、二岁开始就热衷于政治^⑭,有人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尽管他自认为“不具备适合于从事政治活动的气质”^⑮,他还是克制不住行动的激情。他参与创建了一个和平团体(SANE),反对核武器竞赛和越南战争,参加过美国社会党,还专门写了一个小册子支持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竞选美国总统。他不满足于对现实社会的批评,还创立了一套社会改革的理论。他克服了弗洛伊德身上的救世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内在矛盾,继承了马克思的乐观主义精神。

弗罗姆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里继承的以上四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二者都是批判和改造现存社会文化的武器和原则,救世主义则是目的和归宿。

至此,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弗罗姆为什么选择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并从以上四个方面去

理解和继承他们的遗产?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进行初步的分析。

这就要从更深一层的背景上去分析弗罗姆。这种更深一层的背景就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和启蒙运动的精神。以上四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包含在这二者之中。他在论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时总是把他们与犹太——基督教和启蒙运动联系起来^⑤,而他自己的理论创造也充分体现了这两种传统,所以有人称他是“正统学者”。他实际上更接近传统而不同于西方各种现代主义(如存在主义)者。

弗罗姆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样,也是犹太人。弗罗姆的父母都信奉犹太教,他从小生活在充满犹太人传统的世界里。阅读《圣经》、先知们的著作和犹太教法典使他激动不已。他还特别喜欢中世纪教士埃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t,约1260—1327)的著作,而对路德和加尔文新教则持批判态度。犹太——基督教传统对他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性的,“强调人在生活中要以精神、宗教和道德规范为中心”。他说这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传统,接近于中世纪而离现代精神较远。他甚至因父亲是个商人而感到惭愧。他说他是这个商业的或资产阶级的文明的一个异端分子。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对资本主义持尖苛的批判态度。二是政治性的,主张对世界进行变革,以实行这些宗教原则。这种传统包含一种信念,相信世界不会以灾难而告终,世界将会得到拯救,将会比今天更美好。正是这种信念促使弗罗姆形成了乐观的救世主义、和平的国际主义和一种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⑥

实际上,犹太——基督教传统是极其复杂的,如果不把它与启蒙运动结合起来,就不能理解弗罗姆为什么选择性地继承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那些共同遗产,也不能理解他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选择性继承。表面上看,犹太——基督教传统代表着中世纪,而启蒙运动正是对中世纪的反动,这二者是不能统一的。但精神现象是复杂的。启蒙运动

虽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但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又背离了启蒙运动的精神,所以有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过来继承启蒙运动的精神以批判资本主义。而犹太——基督教传统又在现代条件下发生了某种“创造性转换”,那些具有这种背景的人有意无意地发扬了这种传统中与启蒙运动精神相一致的东西。爱因斯坦和弗罗姆谈到的犹太传统都是经过选择的与启蒙运动相一致的东西。启蒙精神无疑是弗罗姆所受的教养的基本因素(在众多的启蒙思想家中,弗罗姆最爱读斯宾诺莎的著作)。这种精神就是用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去批判和改造现实。所以弗罗姆是在犹太——基督教和启蒙精神的立场上来继承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共同遗产的。弗罗姆还继承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动力学和辩证的方法。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不断运动着的复杂结构。弗洛伊德则认为人是一个充满着能量和力的矛盾的复合体。弗罗姆的性格理论和社会历史观都受到这种方法论的影响。

但弗罗姆并不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旗鼓相当的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人物。他认为马克思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就此而言,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他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型科学奠定了基础。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弗洛伊德,他“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对人的科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当然弗罗姆还分别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里继承和发展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和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主要是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异化理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人格理论和精神分析方法等。

此外,弗罗姆还受到禅宗和巴考芬(J. J. Bachofen)的影响。作为新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弗罗姆与赖希、霍尼、沙利文等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及(下转第36页)

者,我们给予表彰和奖励。近年来,我们已有十几位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工作写的论文、教学参考资料等在各级刊物上发表,或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采用。

第四,注意激励的及时性——重视教师自尊、荣誉需要的关切性。

由于历史上尊师传统和现实中的重教风气,及教师劳动的社会价值使得教师对自尊、荣誉的需要显得比其他人更为重视和关切,他们十分重视学生和家长的的评价,十分重视领导和同行的褒贬。因此,我们在实践中应把激励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注意及时反馈,以减少传递过程中的信息损失,同时对广大教师坚持正面疏导、表扬为主的激励方法。近年来,我们联系学校实际,加强了教学常规管理,实行了“三卡”制度(即备课卡、质量分析卡、观摩卡),坚持平时有考查,期中有讲评,期末有总结。我们还制订了“教学情况调查

表”,定期到学生中听取意见,经整理后,及时反馈给有关教师,也使教师及时了解学生意见改进教学。如:有几位学生联名给班上一位英语教师提意见,说他“言词尖刻爱伤人”,学生不喜欢他上课。我们立即在这个班学生中作了调查,并找这位教师个别交换意见,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向他转达了学生意见,帮他分析了原因,使他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成绩与不足。他接受了意见,努力亲近学生,耐心辅导差生,使这个班的学生对英语课由过去的厌学转变为乐学。

对教师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我们都及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和表扬,近年来我校有五十余人次获得了上级表彰,大家感到工作有干头,事业有了奔头。

(责任编辑 雷 实)

(上接第 51 页)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也都有思想上的联系,但这些联系主要表现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就思想背景的基本内容而言,弗罗姆没有从他们那里吸取什么新的东西。

总之,弗罗姆的思想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他“千方百计地把一些不同的思想捏在一起”,把它们“拼成一种马赛克”,或者说对它们进行“创造性的加工”,做成一种“综合物”。但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背景原来是十分清晰的,原来只是一些“构成欧洲文化的基本材料”。他用这些基本材料进行创造性加工所得出的综合物就是——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

注:

① 罗伯特·S·科恩著,陈荷清、范岱年译:《辩证唯物论与卡尔纳普的逻辑经验论》,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 页。

②④⑪⑭⑮⑰ 参见弗罗姆著,张燕译:《在幻

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8 页、第 1—8 页、第 16 页、第 8 页、第 8 页、第 3—4 页。

③ 参见《弗罗姆谈西方社会人的前途问题》(《星星》杂志按),载《哲学译丛》1981 年第 2 期,第 69 页。

⑤⑬ 弗罗姆著,尚新建译:《弗洛伊德的使命》,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2 页、第 97 页。

⑥ Humanism,有时译为人本主义,有时译为人道主义。

⑦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3 页、第 88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3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27 页。

⑩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49 页。

⑫ 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参见《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4—80 页、第 53—56 页。

⑬ 参见《西方学者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15 页、第 74—80 页;《弗洛伊德的使命》,第 2—3 页。

(责任编辑 刘华山)